

一中兩憲

兩岸和平的起點

黃光國◎著



D618
2009/11

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

One China, Two Constitutions: Basis for a
Peaceful Taiwan Strait

黃光國／著



亞太研究系列

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

作 者／黃光國

出 版 者／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宋宏智

登 記 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677 號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5 樓之 6

電 話／(02)2366-0309

傳 真／(02)2366-0310

E - mail /service@ycrc.com.tw

網 址／www.ycrc.com.tw

郵政劃撥／1973535 葉忠賢

印 刷／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I S B N /957-818-763-7

初版一刷／2005 年 11 月

定 價／新臺幣 300 元

總 經 銷／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5 樓之 6

電 話／(02)2366-0309

傳 真／(02)2366-0310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序一

黃光國教授近年來關心國是，對兩岸對抗的危機，特別憂心。他曾在媒體提出「一中兩憲」的主張，思加化解。日前他把這一主張寫成了一本完整的專著，並讓我先讀原稿。我讀了一遍，既佩服黃教授的苦心與遠見，更一時興起許多慨嘆。黃教授要我表示一點意見，我實在也有些讀後感，可簡略地一說。

首先我要說的是：黃教授是一位極富學術造詣的心理學者。他大可埋首學術研究的光環中，自得其樂，但他卻挺身而出，涉入極端複雜且是非不分政治紛爭，如非具有知識份子的德操及對兩岸人民的大愛，如何能夠。

其次，黃教授大著的重點雖在「一中兩憲」，但他卻運用宏觀的視野，從歷史的脈絡及區域政治的結構，也就是從時空交錯的各階段，對兩岸及美日的互動切入察看，然後再就特殊的個案，作微觀的剖析與省思。其中所觀察及討論的問題包括：美國的霸權、美日的同盟、中國的崛起、油源的爭奪、兩岸的對立與經貿交流、台灣的軍購爭議、去中國化的衝突、歐盟的發展，以及一個中國的原則等等。黃教授的析論多能掌握住要點，且能絲絲入扣，一氣呵成，讀來如引人進入時光隧道，先返身到問題的源頭，再置身在眼前的現實。其間的波濤起伏，真令人怵目驚心，但在激盪之餘，也總會使人振臂，要將兩岸的問題根本解決，因非如此，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兩岸人民，亦即整體的中華民族就無法從外力及外侮中奮身而出，走上尊嚴

及康莊的大道。

其三，在經過宏觀及微觀的省察後，黃教授明確地指出兩岸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民族的認同與統合，但問題的解決不僅在文化與道德的指引，更在現實困境的化解。黃教授所主張的「一中兩憲，歐盟經驗」就是理想與現實兼顧的。實際上，兩岸皆有憲法，可算兩憲，但兩個憲法對主權的規定皆包含對方在內，看來互相衝突，但就在衝突中呈現出雙方都主張一中。這樣的「一中兩憲」可以體現一個中國的原則，應是兩岸和解與統合的契機。在步驟上，黃教授則主張參考歐盟的經驗，先建立「超國家組織」的「共同體」，作為統合的起點。他作了很精闢的分析，這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見解。

我與黃教授相知有年，過去曾共同進行學術研究，倡導自由、民主。但自由、民主不能不植根在民族的凝聚與統合，我們皆有共同的認知，也警覺到台灣內部及與對岸之間日趨嚴重的族群衝突。我們擔憂這會帶來人民的大災難。現在黃教授不避艱難，不畏人言，提出發人深省的主張，我特表達我的一些感想，作為呼應與敬意，是為序。

胡佛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二日於大湖山莊

序二

在陳水扁揚言，要在各鄉鎮搞一萬場憲改座談會，把台獨民粹主義極大化的此刻，黃光國教授適時出版他的新著《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這是大恐龍與小蝦米的戰爭，一邊是黨政軍錢壟斷於一人的總統，一邊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而我相信大恐龍不會是贏的一方。

原因是，台獨民粹主義是以「恨」、分化撕裂、罔顧人性和歷史為基礎，靠著綁架百姓而做著個人的政治豪賭。所謂「萬場座談」，只不過是要把人民從對他施政敗德的憤怒裡，把問題轉移方向。這是他們玩弄人民的慣技，我們等著看台灣的老百姓能忍耐被玩弄到幾時。

而黃光國教授在本書的立論，則是以愛與和平存心，從兩岸最大公約數出發，把「一中兩憲」做為新的起點，重建兩岸良性互動架構與行為模式，也可藉以終結民粹式的惡鬥與內耗，替愈來愈不堪的台灣保留最後的元氣。讀書人士以蒼生為念，而政客則執迷於權力和金錢，用人民和不幸來鋪設他們榮華富貴的大道。善惡對比，我們且看惡人還能猖狂到幾時。

近年來，民粹式的「改革」，早已把台灣一步步拖向深淵，「教改」早已成為笑話，現在終於有了「遲來的道歉」；「金改」則形同搶錢大作戰，早已把過去半世紀以來，台灣人民胼手胝足所累積的財產掏空掏光，而今又要搞萬場「憲改」座談會，台灣人民又怎能不快快醒悟呢？

而《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及時推出，它既有外部

意義，更有破解內部台獨民粹主義毀滅衝動的意義。這本書值得每個台灣人閱讀、深思。

南之朔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三日

序三：中國的意涵

《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這部書是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黃光國教授新近完成探討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著作。黃教授是我在台大幾十年的同事，承他好意，將全書書稿先交我閱讀，並希望我寫一篇序言，我深感榮幸。

黃光國教授數十年來從事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卓然有成，蜚聲國際，自成一家，近著《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一書，納入我主編的《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由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黃教授在專業研究之餘，對社會政治事務之關心不遺餘力，是台灣知識份子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多年來拜讀他的時論作品，非常感佩他愛鄉愛國的用心與讀書人的風骨，他的風範常使我想起二十世紀語言學大師杭士基在專業工作之餘，對美國政府的批判與諍言。

黃光國先生這部書中，提出以「一國兩憲」的安排，促使海峽兩岸在二十一世紀邁向一個新的和平的未來。黃教授樂觀地期待兩岸關係的新未來，他說：

台灣雖然是「不完整的國際法人」，然而，如果海峽兩岸都能接受「一中兩憲」的原則，雙方便可以「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地位，展開「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台灣的最大權益，也才能解除許多台灣人民「談判即是投降」，「協商就會被吃掉（統一）」的疑慮。（本書頁 284）

這部書的論述，基本上從國際以及國內脈絡出發，論證以上基本看法。就像任何一部有關政治現實的論著一樣，黃教授這部書中的每一個論點，未必能獲得所有讀者完全的同意或支持，但讀者對黃教授提案的用心之良善，必然有相當的體認。

黃教授所提出的「一中兩憲論」，牽涉問題至為廣泛，我無法也不必要在這篇短文中一一討論，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他的「一中兩憲論」中，最關鍵的核心問題是「一中」，也就是「中國」一詞的定義與內涵問題。我想從思想史角度對「中國」這個名詞及其涵義的演變略加引申說明，以作為讀者閱讀本書時的參考，並就教於黃教授。

從歷史上看，「中國」這個概念孕育並發展於古代東亞以中國為強權的政治背景之中。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形塑了古代中國的政治觀與世界觀，學者稱之為「政治唯我論」(political solipsism)¹、或「中華中心主義」(Sinocentrism)²或「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Sinocentric world order)³。「中國」一詞及其概念，並不是作為一個抽象而普遍的概念，而被古代中國經典的作者或編者所理解或論述。相反地，「中國」一詞在古代中國經典的作者及其解讀者之間，是作為一個具有具體而特殊的指涉內涵並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概念，也乘載特定的中華

¹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上)，頁10及頁16，註54。

²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

³ 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Fairbank ed., *op. cit.*, p.20.

文化價值。

「中國」一詞在中國傳統經典中主要有三種意涵：第一是地理意義的中國，第二是政治範圍的中國，第三是文化世界的中國。就地理意義而言，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的東西南北四方則是邊陲。就政治意義而言，中國是王政施行的區域，《尚書·堯典》記載堯舜即位後，在中國的四方邊界巡狩，中國以外的區域在王政之外，是頑凶之居所，所以〈堯典〉說舜流放四凶於四方。中國經典中常見的「中國」一詞，在早期經典如《詩經》中多半指涉政治或地理之意義，如〈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之類。但是到了《左傳》《公羊》《穀梁》等《春秋》三傳之中，「中國」一詞就取得了豐富的文化意涵，常在華夷之辨的文化脈絡中提出「中國」之概念。孔孟思想中的「中國」一詞，更是乘載鮮明的文化意涵，並以「中國」為文化水準最高之地域。在近代以前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之中，「中國」這個詞稱既指政治意義中作為「天朝」的中國，又指文化意義的中華文化原鄉。

古代中國典籍中將「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合而為一的「中國」概念，傳播到東亞周邊地域如日本和台灣時，就激起了新的轉化。德川時代（1600-1868）日本儒者誦讀中國經典，面對「中國」這個概念及其所預設以「華夷之辨」為中心的東亞政治秩序及其思想內涵時，勢必提出某種新的詮釋，以舒解他們的「文化自我」與「政治自我」之間的分裂，並使中國經

典及其價值理念適應於日本的整體文化風土。日本儒者對「中國」一詞進行意義的重構常常將「中國」一詞解釋為文化意義的「中道」或《春秋》之旨，山鹿素行（1622-1685）就是一個例子。在山鹿素行使用的「中國」一詞指文化意義的「得其中」而言，並不是指政治意義的中華帝國而言。山鹿素行說：「天地之所運，四時之所交，得其中，則風雨寒暑之會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稱中國」，⁴山鹿素行又說日本「得其中」，所以政治安定，三綱不遺，非易姓革命政局動盪之中華帝國可比。⁵經由這種嶄新的詮釋，山鹿素行解構了中國經典中以「中國」一詞指中華帝國兼具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之舊義，並成功地論述日本因為文化上及政治上「得其中」，故遠優於地理上的中華帝國，更有資格被稱為「中國」。此外，日本人也常常以普遍意義的「天」的概念，瓦解「中國」一詞的特殊指涉對象：淺見炯齋（1652-1711）在〈中國辨〉中開宗明義就以天地無所不包，無所不藏，以顛覆東亞世界政治秩序中的華夷之辨，主張「吾國（指日本）固和天地共生」，「各有一分之天下而互無尊卑貴賤之別」。⁶

我們再看「中國」概念在近代台灣的發展。1895 年中日甲

⁴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42），第 13 卷，上冊，頁 234。

⁵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頁 250。

⁶ 淺見炯齋：〈中國辨〉，收入：《山崎闇齋學派》（東京：岩波書店，1982 年日本思想大系版），頁 416。以上論點參考拙作：〈從中日比較思想史的視野論經典詮釋的「脈絡性對換」問題〉，《台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頁 381-402。

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之後，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之後，「中國」這個概念的涵義在台灣發生了變化。通貫整個二十世紀，台灣知識份子心目中的「中國」概念，具有以下兩項特質：

第一，現代台灣的「中國」概念包括「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 與「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 兩個部份，而且前者遠比後者更重要，因為「文化認同」具有抽象性、理想性與長期性，與「政治認同」的具體性、現實性與短期性構成鮮明對比，而且「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更為悠久而重要。舉例言之，1895 年割讓台灣之後的台灣首富李春生 (1813-1924) 於 1896 年應日本殖民當局之邀赴日訪問，回台後撰寫東遊隨筆，申言「新恩雖厚，舊義難忘」，⁷並三度以「棄地遺民」自況。⁸撰寫《台灣通史》的連橫 (雅堂，1878-1936) 也自稱「棄地遺民」。⁹李春生與連橫之所以自稱「遺民」，基於對中華大地的「文化認同」的意義，實遠大於對統治中國的政權之「政治認同」，這也就是國學大師章炳麟 (太炎，1869-1936) 所謂「台灣，故國也」¹⁰的確切涵義。

在日本帝國統治之下，日據時代 (1895-1945) 台灣知識份子對「文化中國」滿懷浪漫的想像，例如台中地區文化人葉榮鍾 (1900-1956)，作家吳濁流 (1900-1976)，醫生兼作家吳新

⁷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州：美華書局，1896)，頁 51。

⁸ 同上書，頁 9、51、82。

⁹ 連橫：〈與林子超先生書〉，《雅堂文集》(台灣文獻叢刊)，頁 127。

¹⁰ 章炳麟：〈臺灣通史序〉(1927)，收入：《章氏叢書三編·太炎文錄續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1938)，卷 2，下。

榮（1906-1967），以及在大陸經商的吳三連（1899-1988），都將中國大陸視為文化的原鄉，我在舊作中曾有所討論。¹¹作家張深切（1904-1965）在日據時代的剃髮經驗，很能闡釋當時台灣人心目中作為「文化認同」意義的「中國想像」。張深切在剪髮時的痛哭流涕，¹²正是他的「文化中國」認同被撕裂後的痛苦！

第二，在現代台灣的「中國」概念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既是抽象的理念，又涉及具體的現實生活，兩者間既聯合又鬥爭，兩者間既有其相互滲透性，又有其緊張性。日據時代台灣人對於原鄉的傳統中華文化，固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下而不勝其嚮往之情，但是，台灣人由於過於一廂情願，也過於浪漫，未能深入認識中國歷史上文化理想與現實專制政治之間恆處於緊張甚至衝突之關係，也未能認識他們的「中國想像」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相互矛盾性，這是日據時代回歸原鄉的台灣知識份子祖國夢碎的原因，也是光復後台灣人對國民黨失望的思想根源。¹³

現代台灣人世界觀中「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分野及其張力關係，在最近二十餘年來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展，而日益彰顯兩者間之緊張性。從「中國」這個概念及其在日本與

¹¹ 參考：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大陸經驗——「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收入：氏著：《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頁 104-137。

¹²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1998），卷 1，頁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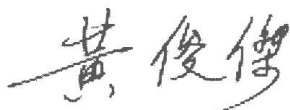
¹³ 黃俊傑：〈論「台灣意識」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關係〉，收入：氏著：《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頁 48-81。

台灣的轉化，我們可以發現：所謂「中國」或「中國性」（Chineseness），其實是相當複雜的「概念叢」（ideas complex）。從「中國」概念的內在結構的角度來看，「中國」這個概念至少包括「文化中國」、「地理中國」與「政治中國」諸概念，而以「文化中國」居於最重要之地位。再從「中國」概念之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的進程塑造了兩種「中國」：一是以福建、廣東、香港、台灣、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會為主的「海路的中國」；一是以中原為主體，包括蒙古、中亞以及絲路所及之地的「陸路的中國」。¹⁴以上諸多「中國」概念在歷史進程中，共同構成了「中國性」。

但是，從東亞周邊地域的觀點來看，「中國」這個概念又包括：作為「精神移住地」的「中國」，與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中國」。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中國」或「中國性」的概念，都不是地理的疆域所能律定的。反之，「中國」或「中國性」是一種移動的概念。日本許多思想人物以「中國」一詞指稱日本，因為日本得孔子之道與《春秋》之精神。現代台灣人的世界觀中的「中國」，又可分為「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兩個概念，兩者之間既不可分割但又互為緊張。隨著海峽兩岸的長期分隔，以及台灣的快速民主化進程，「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這兩個概念之間的互滲關係與緊張關係日益加深，特別值得觀察。

¹⁴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頁306。

我從思想史角度，簡略說明「中國」這個詞稱及其轉化的軌跡，主要是想就「中國」的內涵之複雜性、多層次性及其遊移性，為黃教授這部書所提出的「一中兩憲」的論旨略作補充。我們在思考黃教授「一中兩憲論」的提案時，如果扣緊「中國」概念這個核心問題深入探討，必可獲得更為深刻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黃教授這部書是我們探索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新發展的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黃俊傑' (Huang Junde) in a cursive style.

2005 年 10 月 7 日

於台灣大學歷史系

序四

黃光國教授最近完成《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的大作，問序於我，欣然同意。黃教授乃國內外著名心理學家，卻能超越心理學以個體為研究對象的微觀層次，對社會問題與國家大事從事宏觀的剖析。他對台灣的民主法治與社會公道，以及兩岸關係的和平演進，向來十分關心。遇到重大社會與政治問題，他總是努力瞭解，深入思辨。每有所論自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鞭辟入裏，入木三分。尤有進者，他常能言人所不願言，言人所不敢言。他的名著《民粹亡台論》是如此，這本《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也是如此。

建構兩岸的和平關係，以利台灣民主、法治及均富的長期發展，乃黃教授近年來特別縈繞於心的重大問題。在學術研究的百忙之中，他終於在短期內寫完這部應時的著作，呈現了他殫思竭慮的成果，也表達了他作為一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風範。為了能在八、九兩章有效分析與闡揚「一中兩憲，歐盟經驗」的論旨，黃教授在前七章中鋪敘了大量性質不同的文獻資料。這些種類互異的資料，不可能在短期內蒐集齊全，可見他在相關文獻的尋覓上已經花費了長久的時間。

本書出版後，黃教授所提出之「一中兩憲，歐盟經驗」的構想，勢將成為討論長久維持兩岸和平關係之道的一個重要選項。他所熱心倡議的這一方案，究竟有哪些優點與問題，有待關心兩岸和平議題的有識之士多加討論。個人在此只想提出一點意見：在解決兩岸關係的爭議時，歐盟經驗的確值得參考，

但也只能重其精神，不必拘泥於其具體條件。例如，加入歐盟的三條件是實行民主與法治、保障人權合乎標準、及建立市場經濟運作制度。若要建立「中盟」這種上位共同體，前兩項條件就難有共識。這一類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有待黃教授及有識之士進一步討論。

楊國樞

謹序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一日